

高教前沿

2022年第3期

(总第44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编

2022年11月18日

目 录

高教资讯

“有组织科研”对高校意味着什么-----1

《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发布-----4

高教视点

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5

面向2035：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思考-----9

大学治理

大学文化治理：大学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路径-----14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15

调查研究

高校应尽快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工具-----17

教育学发展要适应高质量建设-----20

以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优势为基础、瞄准“卡脖子”问题——

“有组织科研”对高校意味着什么

9月6日，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要求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此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

作为正式进入文件的新语汇，围绕“有组织科研”的讨论迅速升温。在高校视野中，有组织科研意味着什么，与以往的相关政策有何关联？记者进行了采访。

瞄准“卡脖子”问题，高校有组织科研不是“撒胡椒面”

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强化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引领的先发优势，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两院院士大会指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制度创新就是有组织科研的先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副研究员秦冠英分析，会议提出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而这次《意见》明确了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定位。“传统上，战略科技攻关多依赖科研院所，但科技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人才，需要高校培养大批的高质量顶尖人才，打通科技攻关链和人才培养链是《意见》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意味着高校需要承担更重要的使命。”

“有组织科研，大的背景是针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就是‘卡脖子’技术的问题。相关部门也在盘点我们的科研攻关主体力量，对高校寄予厚望。健全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有组织科研，集中优势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说。

“有组织科研不是撒胡椒面、雨露均沾，更不是文字层面理解的对科研过程予以组织，而是特定的、有目标、有侧重、精准化的科研发展规划，《意见》里说的很清楚，以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优势为基础，这两点框定了范围，也就是说聚焦战略高技术、高端产业等领域，依靠高校优势学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科学攻关。”秦冠英表示。

任务驱动、团队协作，高校有组织科研不能“闭门造车”

在长期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卢晓中看来，广东省2022年新增的“双一流”建设学科点就体现了向国家重大需求倾斜、关键核心技术的倾斜，向基础学校倾斜。“一个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作物学，一个是广州医科大学的呼吸临床医学，一个是南方科大的基础数学，它们都很符合以上倾斜的学科特征。广东这三个学科能进入‘双一流’建设，我想也是有组织科研带来的成效。”

“学科发展需要有组织地去建设，而关键核心技术需要有厚实的学科积淀，这也是高校承担科技攻关任务的优势所在。”卢晓中介绍，2015年左右在国家出台“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同时，广东省在“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中布局了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当时就考虑到广东高校的学科结构在理工科方面是短板，难以支撑广东十大支柱产业。所以，这批对标支柱产业的学科建设在大湾区层面就是一种‘有组织科研’。”

卢晓中认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有组织科研还意味着组织形式的变革。“高校内部传统的学术组织主要是以科层组织为特征，比如像学部、学院、系这样的纵向组织，条条分割造成交叉融合很困难，现在我们需要建立和发展以科研目标与项目为驱动的研究中心，这是一种横向的组织结构，纵横交错形成矩阵式的高校内部组织构建。现在虽然建立了交叉学科的大类，但具体运行、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高等教育系统实现科研资源集群化发展、高校内部形成矩阵式学术组织结构，有助解决学科交叉融合问题。”

“大的问题由需求决定，但问题分解成项目，仍要依靠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提出，“有组织科研是重大任务驱动的研究，选题由谁提出？项目由谁审定？成果由谁评价？这三个方面如果完全由行政主导，就有可能

‘拉郎配’。有组织科研需要有行政力量介入，但不能闭门造车，行政要促进知识的整合。”

“有组织科研的评价机制要有利于团队协同攻关，同时要注重对成果的考核。”卢晓中表示，“以往的科研项目中，重立项不重成果考核、验收周期一刀切等问题都应尽力解决，还要科学合理地评价成员的贡献，建立合作共享成果的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大家参与有组织科研的积极性。”

“科研和人才培养都是高校的重要使命。高校在培养人才上效果比较显著，但是在重大攻关项目上，响应国家需求的程度还不够。对高校而言，承担有组织科研的新任务，意味着评价体系要进行重新调整。”杨宏山说。

揭榜挂帅、鼓励能者上，高校有组织科研要注重人才培养

《意见》既提出高校“要继续充分发挥好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又指出要“加快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大突破”，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的目标导向是否存在矛盾呢？

“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有组织的科研，是包容自由探索的。科研尤其原创知识的生产过程，有时候是个人的好奇心驱动的结果，研究兴趣和灵感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过程中，揭榜挂帅、鼓励能者上，就是将那些在自由探索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吸纳进来，进入有组织科研的体系中担当大任。”杨宏山说。

“《意见》提出的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非常值得讨论，这个目标是应用层面的，而基础研究则是找到支撑这个应用目标的自由探索。”卢晓中举例，“芯片性能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基础研究命题，比如实现某种性能的功能材料就属于基础研究。在这个领域，研究者需要自由探索，以最终形成的成果服务于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会给相关领域带来更多投入，但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加强人才培养质量仍是高校的主责主业，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支撑，这在高校实施有组织科研的背景下更值得强调。”秦冠英说，“《意见》第六点举措提出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要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实施高校优秀青年团队建设计划，这意味着，依托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依然是高校有组织科研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目标。”

（作者：刘博超 来源：《光明日报》2022-9-20）

《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发布

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教育部、国资委共同组织召开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推进会，18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联合发布《卓越工程师培养北京宣言》。

宣言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共振，促进全球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迈进。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最大程度地发挥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大力推动科学发展和工程创新。

宣言强调，科学和工程是造福人类、驱动历史的双引擎。工程与科技的结合，把科学发现和产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放眼世界，工程科技是时代演进、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推动力量。从古代农耕文明到近代数次产业革命，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高度。立足中国，工程科技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的坚实支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昭示，工程科技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安危。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创新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离不开工程科技的持续创新。共创未来，工程科技是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的关键要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实践中，工程科技创新是破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应对全球性挑战，创造美好未来的题中之义。

宣言明确加快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共同使命。作为世界工程教育第一大国，我国工程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培养造就千万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显著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提升中国工业化水平，为中国乃至全球产业进步提供坚实的智力供给。工程实践的快速发展呼唤我国工程教育理念、体制和路径的全方位变革，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着力解决关键领域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工程教育与工程能力培养脱节等突出问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大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形成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

宣言倡议，要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培养造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大批卓越工程师。要始终秉承创新追求，在再造培养要素、转变培养模式、变革培养体系、重构导师队伍、完善评价标准、发展智慧教育等方面下功夫。要始终致力协同联动，充分调动校企积极性，联合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实现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工程实践深度融合。要始终推行教学相长，坚持学生主体地位，遵循工程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促进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要始终着眼开放合作，健全中国特色的卓越工程师能力标准，推动与职业资格认证有机衔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相得益彰的卓越工程师认证体系。要始终贯穿人文关怀，着力培养以人为本、德才兼备，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卓越工程师。

18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决心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勠力同心、倾情投入，踔厉奋发、勇于创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同谱写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新篇章，在世界工程教育界响亮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高毅哲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9-28）

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编者按：近日，由全球大学创新网络（GUNI）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编写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2030的高等教育新愿景》在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报告从八个方面描绘了全球高等教育现状与趋势，并对未来10年及以后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勾勒。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世界存在基础设施、科技和知识鸿沟，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这种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不平等加剧。国际大学协会调查发现，疫情期间欧洲国家85%的大学采用了在线教学模式，而非洲国家却只有29%的高校使用在线教学。报告分析认为，这种不平等源自结构不平等，并提出当前高等教育向数字学习过渡，不仅需要科技，还应注重为使用者赋能，将人放在第一位。同时，政府、公共和私立合作伙伴应合力缩小数字鸿沟，加强网络连接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高质量数字学习内容，并帮

助教师掌握远程和混合教学模式。

报告还认为，健康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相伴，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比如录取、培养和就业等。为此，大学和高校应积极制定相应战略计划，努力为学生和高校提供经费支持，推动性别平等，并对受教育权这一概念进行升级和拓展。

从终身学习视角培养素养和技能

当前，全球挑战、科技创新、全球化和经济社会变革正在影响全球各项工作领域，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要求人类采用新的知识和技能去应对。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当前人类所获取的技能和未来10年工作的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匹配。报告认为，我们需要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再培训与获取新技能，甚至做好对职业部门进行改革的准备。

为此，报告特别推荐两种新技能——横向技能（Transversal Skills）和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并强调个人学习责任。其中，横向技能包括适应能力和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与人相处能力。个人学习责任则指赋能学生，使其为自身学习以及职业发展负责。报告认为，应以学生为学习中心，聚焦问题而非答案，强调深度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继续重视记忆的作用，并采用让学生参与相关过程的新的评估方法。报告还提出，应超越时空，推动全方位学习和终身学习，鼓励高等教育机构转变角色，缓解人才技能培养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等情况，主动融入当地生态系统和社会，为实现进步、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等人类共同目标而努力。

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

报告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关注人文学科，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环境、他人及自己。而且，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不应是割裂的，而应在知识生态系统框架内，与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一起通过系统思维进行理解。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应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并从三个方面培养未来公民。首先，学会融入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但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这些支柱概念应进行扩展，如学会共处须超越人类互动范畴，关注环境人文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其次，学会与社区融为一体。高校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主动服务于社会，借助人文学科将各相关方联系起来，创造网络，构建多样化、全球化社区，聚焦培养未来公民，并注意求同存异。最后，学会

开发个人潜能。关注个人及情感的作用，特别是注重艺术、绘画、文学、音乐等在情感中的中心作用，帮助个人平衡生活并享受生活的过程。

推动研究与创新服务社会变革需要

新冠疫苗研发表明，知识研究和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因素，而此次疫情危机也揭示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意义。在社会、政府和产业协调框架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研究和创新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报告认为，研究和创新须与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同步进行，与此同时，可持续不应被视为一种需求，而应作为一种增长的机遇，大学应在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要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稳固的桥梁，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其次，适时将知识转化为创新，并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更具创业精神和跨学科性，以应对未来挑战。再其次，加强研究和创新分享与合作，并促进相关领域向世界开放。最后，更新学界评估标准。传统评估指标侧重于出版物数量、影响因子和全球排名，但决不可以此取代专家判断和定性评估，同时还应关注科研操守、创造力和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等。

构建更包容和可获取的大学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高等教育范式正在发生变化，教育法甚至大学的培养模式也在被重塑。具体而言，在线教育如慕课等通过信息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数字化则对培养模式提出了新挑战。欧洲大学协会曾提出“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今天日益常见的“虚拟校园”让“大学”这一概念更为模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趋势。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只有置于学习和教育管理数字生态系统框架，才能发挥作用。欧盟于2020年推出《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其目标正是开发出一个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报告提出，数字技术应作为一种媒介，并由此引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教育成本并惠及更多受益者；二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推动高等教育更具灵活性并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三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世界最佳学习模式。报告还表示，在线与面对面学习模式应相辅相成。尽管在线学习模式有明显优势，但面对面学习仍然有增值空间，因为学生能够从这种社会交往中受益。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主义已成为世界争论的焦点，但应找到契合点，将人和人的生命放在科技发展的中心。最后，报告建议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权利和优先事项。

通过重塑大学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表示，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定了一个更细致的教育框架，为教育的每一阶段明确了特征和使命。其中，高等教育为青年未来职业发展和成为合格公民搭建桥梁，因此对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变革作用。国际大学协会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变革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功能；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联系当地社会与国际社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要想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并整体变革高等教育机构。报告建议，一是确立联系或协同思想，包括与环境 and 各方人士联系、与不同领域知识联系以及与高等教育机构内外联系等；二是变革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例如使用批判性思维、勇于参与、自我约束并积极采取行动等。同时，不仅要环境视角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要重视社会情感方面的教育。

为实现共同目标加强国际合作

报告强调，全球挑战只能通过全球方案解决。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等，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我们呼唤一种协调性、决定性和全球性的干预。对此，高等教育机构不能视而不见，因为这些挑战既损害未来人类的利益，也对当代人造成影响。应对这些全球挑战，须注意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身份——它们既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又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具有地区和国际双重影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机构紧密合作。为此，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政策与实践极为重要。

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行动，相关国际化政策与实践可以成为内部变革的催化剂，但不能与所属机构割裂开来。譬如，它们可以成为教育变革实验室，但不能违背机构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而尊重并维护其身份与独特性，是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程度须在竞争与合作、差异与融入以及独特性与同质性之间找到平衡，以更好地服务核心理念和使命。当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还应将机构灵活性、开放性与加强透明性的承诺及创新的魄力结合起来。

建立坚韧、创新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使高等教育机构治理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关于高等教育机构治理，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但存在一些

共同的因素，包括决策、选举、自治权、利益相关方、高等教育机构互动、开放性和经费等。西方学者鲍德里奇曾在1971年将大学治理模式归纳为官僚、学术组织、政治三种模式，学者布雷奇和科根则于2007年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利益相关者组织。报告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网络知识社会，应该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更具开放性、合作性及灵活性。

报告表示，鉴于当前复杂形势，没必要采用一种标准化治理模式，但须认真学习成功治理模式的四个因素，包括尊重机构文化、确保学术团体参与相关决策过程、适当推动与其他大学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加大当地社会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力度等。报告还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提升相关人员专业背景，如新聘用专家应具有新兴学科背景等。同时，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界限日益模糊，应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打破壁垒，吸引更多具有开放性、合作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还应重视青年和女性人才，不断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和领导力建设。

（作者：黄金鲁克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9-1）

面向2035：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思考

编者按：2035年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标这一远景目标，近年来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了教育、科技、产业等各方面的很多战略规划，为各个领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制订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高校学科发展事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实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全局。可见，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既是教育问题，又是科技问题，还是产业问题，既关联当下的学科建设实践，又链接未来的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是一项牵涉极广，影响极大的教育决策。本文认为，当以“面向2035”为逻辑起点，遵循“现实与未来相关照”“学科内外部发展逻辑相统一”“多元主体、多种因素相协调”的逻辑理路，对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进行系统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思考。

面向2035，学科优化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学科的调整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等方面的影响，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不是简单的当前任务，而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脉络看，我国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是一个不断进行“裂变”“分化”和“更新”的过程，新时代高校学科

优化调整布局既承接着历史的遗传基因，也孕育着未来的更新创造。

目前，我国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到了不得不“变”以及必须思考“如何之变”的历史拐点。一方面，2022年9月1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正式开启新时代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布局的先局，既预示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厚植人力资本、激活创新动能和抢占科技高地方面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又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将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结构、创新目录管理机制等战略举措，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并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学科体系建设存在的科类分布结构固化、学科发展模式僵化、学科产业联动薄弱、学科调整机制虚化、结构体系臃肿失调、学科交叉机制不畅等问题，也催生了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如何“面向未来”的时代命题。

从体系完整性看，我国高校已具备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加之功利性评价导向的影响，一些传统学科以及急难险重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从分布均衡性看，尽管近年来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地区建设，但在西部、东北老工业区等存在地域弱势的区域，学科规模结构的不均衡性问题仍比较突出，同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区域，则存在着应用学科关注度高、基础学科不受重视等问题；从产业匹配度看，目前我国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总体相匹配，但学科的设置、水平、口径等与产业发展匹配还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不能完全满足产业不断发展的需求；从前沿引领性看，随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不断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学科的设置、水平、类型等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仍然动力不足；从集聚融合性看，学科间的融合交叉、学科发展与社会的良好互动已初显成效，但学科集群的发展和集聚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此外，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中还存在一些潜在冲突，如计划性与市场性的冲突，规范性与多元需求的冲突，封闭性与开放需求的冲突，滞后性与前瞻需求的冲突，部门性与协同需求的冲突，国家需求与学科自身需求的冲突。

总之，“面向2035”事实上成了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

面向2035，学科优化要探索学科内外部发展逻辑相统一

从高校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学科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看，学科的生成性是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前提，学科是知识的客观发展和人类需求的主动建构相

结合的产物，因此学科的产生、发展、衰落等过程，既有客观性，也有人为建构性；学科的自主性是高校学科优化布局调整的基础，尽管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学科具有世界性，但与国家战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紧密结合的学科也具有国家性，因此要想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学科的自主发展是前提。当然，学科的自主发展并非排斥借鉴学习，学科的生成总是起步于借鉴学习，但借鉴学习的目的是寻求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才是学科自主发展的最终归宿；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是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关键，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学科间的边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说学科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必须关注学科间的相互支撑和融通，挖掘学科集群的作用，以使学科建设发挥更大效益。

从高校学科建设的外在逻辑看，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首先应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学科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系统性认识的成果，因此学科发展中既有知识增长和深化的本体价值，也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功用价值，而且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所在社会的支持，任何国家的学科发展都会充分考虑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产业升级，技术更新换代、提质增效等都需要知识、理论的深度参与和支持。其次，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应主动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国家战略需要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前，学科发展更能找到突破口，更能获得发展的原动力，更有可能实现重大突破和原始创新，为提升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作出更大贡献。最后，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应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学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教育界、科技界、产业界的纽带，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联动，无论是满足社会发展现实需求还是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都并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它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既要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又要抓住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以使高校学科建设合理、有效。

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要在高校学科的生成性、自主性和内在关联性与满足国家、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现实需求之间寻找到衔接点，也就是要实现其内外在逻辑的统一。为此，一是看是否能构建起一种以学科发展内外部协调、学科间相互支撑融通、学科与社会间良好互动等为特征的学科生态系统；二是看学科建设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学科建设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只有满足社会的长远利益，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才是内外部逻辑协调统一的具体体

现。三是看知识生产新模式与内外部逻辑的协调统一。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世界的知识生产越来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由于知识生产相对比较封闭，因此学科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经常产生冲突和矛盾，而以开放性为核心特征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则表现出组织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跨学科性、知识生产的应用情境性等特点，为内外部逻辑的协调统一带来了可能性。超越学科发展内在逻辑与学科应用外在逻辑的对立，实现两者的同构共生，已经成为未来学科建设的趋势。

面向2035，学科优化需要多元主体、多种因素的协同参与

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应围绕以下方面构建战略方案：一是优化调整科类结构，使其更加合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二是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打造“高峰”学科，实现提升学科整体水平的目的。三是优化调整学科区域分布，持续提升其均衡性及与区域发展的匹配度。四是对不同类型的学科应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促进学科集群和交叉的发展，构建更为健康的学科生态系统。

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将多元学科建设主体发展为协同参与的“合作生产者”，共同致力于学科系统生态的构建。因此，第一，明确多元主体的权责，建立多主体协同联动的宏观管理机制。高校学科建设的实施涉及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也涉及多部门的分管领域，同时还涉及高校、二级学院、企业单位等各种组织和机构。因此，构建协调多主体利益的协同联动机制是协调多主体利益需求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政府是统筹规划高校学科建设的主导力量，中央政府统筹全国和各部委，地方政府统筹辖区内高校的学科建设，提供相应的条件保障支持，将学科建设落到实处；高等学校是学科建设的实施主体，应通过学科建设回应政府的主要战略要求，这就要求政府赋予高等学校更多的学科建设自主权；二级学院是学科建设的具体执行者，要从国家大局出发，走出本学科和小部门的局限，避免陷入封闭的学科逻辑以及僵化的学科本位意识当中；企业单位等社会机构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应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对高校的学科建设提出建议，并与高校一起积极推动所在领域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以实现高校和企业的共赢发展。

第二，改革学科资源配置机制，促进学科分类发展。资源配置是引导学科健康发展的有力抓手，可通过改进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力度实现学科的优化调整布局，对不同类型学科实施分类管理。首先，构建政府主导的基础学科持续性资源配置模

式。基础学科的发展一般需要较多资金支持，还具有资金投入与成果产出不完全匹配的特点，因而基础学科的资源配置更多应是政府责任，要考虑其长远性、公共性，而不能依靠市场，只注重效益。其次，建立市场主导的应用学科绩效型资源配置模式。对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而言，可以充分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学科建设的绩效来引导资源配置，释放应用型学科的特点，激发学科创新活力。最后，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新兴学科资源配置模式。新兴学科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产业前景，对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重塑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构建政府和市场结合的新兴学科资源配置模式，既能更有效地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又能和企业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推进学科优化调整布局。

第三，消解学科与专业的隔阂，探索“学科—专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因历史的管理惯性，我国高校学科和专业存在较大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割裂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落实面向2035的高校学科建设，需要探索建立“学科—专业”融合发展机制。首先，要从顶层设计、组织建设和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统筹考虑，对此，应牢牢抓住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两大产出导向，从协同规划、协同机制、协同内容等方面着手探索改革方案。其次，要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权，鼓励学校探索“学科—专业”融合机制，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真正做到因学科发展而异，“一科一策”。最后，打通高校“本—研”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科研体系。重科研、轻教学，重学科建设、轻专业建设等问题一直存在于高校当中。为此，应从融合发展出发，通过机制改革，将科研与教学、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间的“零和”关系转变为“强—强”促进关系。

第四，改革学科评价体系，构建评价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为促进学科整体发展，激发学科发展活力，既要建立起对学科本身的评价机制，又要构建起对学科建设的长效评价机制。首先，构建更为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学科特性，以及不同类型学科发展的不同路径，在评价标准、方法、程序等方面凸显这些差异，同时，应更关注学科的真实水平和发展潜力，避免简单化的排名评价和定量评价，对学科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衡量。其次，引进多元评价主体，并在学科评价中真正发挥作用，政府、高校、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都可以对学科发展进行评价，但应在资格审查、标准考量、作用机制、实施原则和评价结果运用等方面充分把关，以使各个评价主体在学科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后，构建评价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学科评价并非只对学科本身进行评价，还应对学科优化调整布

局进行评价，从实际效果出发，评价学科优化调整布局的具体行为是否科学、合理，后续影响如何等，以便为今后的实践提供改进依据。

（作者：邬大光 来源：《光明日报》2022-10-11）

大学文化治理：大学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路径

大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大学也是特别需要文化治理的现代组织，大学治理范式转型需要开展大学文化治理的有益尝试。当前，学界关于大学文化治理的内涵与机理阐释不清，且存在对象论与工具论之争，这影响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推进和践行。研究阐明了大学文化治理的逻辑前提，揭示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本质，论证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机制和载体，明确了大学文化治理的可行策略，对于推进大学治理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大学文化是大学治理的一种工具，认为大学文化治理的过程就是以大学文化为基础来绘制大学治理的意义，促使个体形成共同的角色认知、文化期望和理想信念等，进而形成大学治理的集体行动。

大学文化发挥治理功能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一次性的大学治理过程，而是一个在大学实践过程中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关联的、循环往复的大学治理过程。大学文化治理中的“冲突-调适”机制就是不同治理主体所代表的治理力量在相互的理解、适应、对话和交流中呈现出的此消彼长、波浪式运动的文化理解和互动过程。

立足于大学文化治理的行动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大学文化治理应该在以下四个层面开展行动：其一，要树立文化治理的自觉意识，重视大学文化在大学治理中的积极功用；其二，要加强对大学文化的理性选择，并将其嵌入大学治理的结构与过程之中；其三，要培育良好的大学治理文化，将构建和培育优良的大学治理文化作为大学文化治理的战略抓手；其四，要推进从大学文化到大学治理的文化转化，保障大学文化在“组织—制度—人”构成的复合保障体系中有效地转化为具体的大学治理行动。

因此，大学要开展和实践文化治理，就需要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自觉，保障大学人对大学治理的理念、目标、机制和过程等形成清醒的文化认知，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足够的内生动力，推进大学治理整体目标的实现。

（作者：牛军明 来源：《江苏高教》2022年第8期）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2022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时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全过程。在教育领域，新技术在融入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也在不断创新和拓展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指出，“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新时代高校领导干部要紧紧抓住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机遇，顺应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新趋势，学会用“数字化思维”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的核心在于创建支撑实时感知诊断、动态分析预测、即时判断决策的新型基础建设环境。基于数据驱动，对多场景、全过程、多模态的大数据进行关联交叉与分析计算，突破传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暗箱”问题，将教育治理过程可视化、颗粒化与透明化，从而增强教育预测、诊断与决策能力。

在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思路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通过深入分析挖掘教育教学大数据，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教育流程可视化、治理决策精准化；从模式创变看，运用技术将高校治理过程中的新型基础设施、管理方式、评价形式、育人模式等主要元素进行系统性重构、重组，实现教育治理模式的创变，提升高校教育系统的运行活力和服务价值，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形成开放性、适应性、可持续性的良好教育治理新生态。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教育治理在社会发展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被赋予了重大使命与责任。从“互联网”走向“物联网”“二维空间”转向“三维空间”的虚实融合复杂环境下，传统教育治理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加剧，数据善治、技术善用等更加凸显了教育治理的紧迫性与复杂性。高校治理作为教育治理的关键一环，应及时更新现代化治理手段与工具，拓宽治理场域，积极依托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水平，打造多元协同

共治与科学精准治理的新格局。

数字技术在教育治理领域中的嵌入，即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不仅为完善教育治理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也为治理主体间“协同共治”提供可能。因此，技术赋能教育治理机制体制的建立、治理新活力的激发、教育主体的共建共享，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高校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数字技术赋能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求。

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第一，应转变教育观念。高校应从传统“等级制、经验化”的老套路转为数字时代“扁平化、精准化”的数字化治理新思路，加强高校管理者、广大师生数字化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支撑高校治理过程“知行创”的合一。

第二，重组教育要素与模式，实现教育治理关键要素的系统性变革。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通过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数据融通、教学与评价模式变革，实现教育治理中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全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第三，打造智慧教育服务新体系，以“物联、数联、智联”为目标推进“5G+云网”融合。持续建设信息网络、平台系统、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数据融合融通的智慧育人服务体系。

第四，充分发挥教育大数据效能，实现“数据代言”。新时代的教育治理应积极依托教育大数据，构建数据支撑的评估决策分析体系，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打破数据壁垒，消除信息孤岛，推进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联动，实现协同化、科学化治理，打造精准科学的治理新模式，提升以数字化助推高校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效能。

具体而言，高校在把握数字化时代发展新机遇时，一是要坚持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绘制“智慧校园”建设蓝图，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包括创新数字化治理体系、创建智慧育人环境、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加强数据与技术治理、实现资源治理新模式等。二是要优化新型智慧环境支撑功能，打造网络化、沉浸式、智能化的育人环境。通过推进校园物联网、教育专网等“四网”融合，建立面向“感知终端+平台+场景”的物联网体系架构，打造虚实融合的智慧环境。三是要聚合融通各类智慧平台，推动数字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互融互通与共建共享，推动教育治理过程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可

视化。四是要创新“数据赋能+多元共治+技术善治”治理路径。打造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权责分明、团结合作、协同治理新局面。完善数字认证体系，建立数据共享审核制度，明确数据共享属性和范围，规范共享流程，保障技术善治善用，发挥数据在治理中的最大效能。

数字化技术与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是高校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目标建设的现实需求，高校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育人初心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相结合，坚持多元协同与科学决策相统一。既立足当下，解决高校发展存在的难点、热点、堵点，又着眼未来，为高校可持续发展增能与蓄势，建立数字化转型推进高校“共建共享、共治共赢”教育治理的新生态。

（作者：查道林 来源：《光明日报》 2022-10-11）

一项针对大学教师关切重点的调查表明——

高校应尽快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工具

编者按：了解并回应大学教师的关切，着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的内在工作，对于促进高校改进工作，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课题组面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抽样高校的教师开展问卷调查，共获得184所本科院校的有效教师问卷8000余份。课题组对开放题“您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哪些意见和建议？”的回答内容分析研究后发现，大学教师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管理、教师薪酬待遇、教师评价制度、教师发展五个方面，且大都与本科教学工作有关，反映出大学教师对教书育人工作的重视程度。课题组还就此对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师进行了访谈，问卷调查结果在访谈中得到印证。

关切问题集中在五大方面

本科教育教学——应采取实质性措施、聚焦实际效果。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大学教师对本科教育教学的关注度最高。教师们普遍认为重视本科教学要采取更加实质性的举措，“实事求是地总结本科教学改革的效果，不能只颁布改革条例和措施”。他们针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建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优化

资源配置，强调资源分配向教学倾斜。二是完善制度，凸显教学重要性，如“制定差异化管理政策，促进不同类型教师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教学或科研等主要任务”等。三是多种途径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如“倡导开展本科教学学术研究”等。四是加强过程管理，严格把控人才培养质量，如“要对学生严格要求，狠抓学风，加强过程性考核，实现严进严出”等。

学校管理导向——应支持教师更专注于教学和研究。教师们提出的建议可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希望学校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精简办事程序，让教师能有更多时间精力专注于教学和研究。二是呼吁加强学校制度建设，特别是加强教师评价、教学评价、教学质量奖惩、职称评审、绩效评价、教师继续教育及培训等制度建设，并且强烈建议提高教学在各类评价考核中的占比。三是希望学校行政部门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态度，对教师有更多信任、更多尊重和更多人文关怀。四是希望有更多民主参与机会和民主监督权，特别希望在制定与教师相关的政策时“多开展调研，多了解一线教师心声并认真对待”。

教师薪酬待遇——应充分体现教学工作量和教学价值。《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完善高校内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向扎根教学一线、业绩突出的教师倾斜。问卷调查显示，教师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课题组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也表明，不少学校正积极推进和落实文件精神。教师关于提高工资待遇的意见建议，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合理提高工资薪酬，优化薪酬体系结构，尤其要体现教学工作量和教学工作的价值，如“教师的薪酬不应只看上课的时间，还应考虑课前备课、课后答疑和在课程反思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关注特殊群体如民办高校教师、一线教师、青年教师等的薪酬。三是兼顾公平和效率。四是细化优化福利待遇，如设置学术休假制度、关注教师身心健康、改善教师办公条件等。

教师评价制度——期待“破五唯”、“立新标”、重教学。大学教师关于教师评价考核制度方面的意见建议，涉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教学评价、评优评先等内容。广大教师有如下期许：一是期待“破五唯”的同时能够尽快“立”出更合理的新标准。二是希望评价过程更公平、评价内容更全面、评价更强调教学。三是就评价方式而言，建议分类开展职称评审。四是建议为教师参加职称评审提供更多支持、人文关怀和反馈渠道。

大学教师发展——应关注青年教师长远发展。问卷调查显示，大学教师尤其是

青年教师普遍关注自身职业发展，他们提出的建议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希望学校做好师资队伍建设顶层设计，注重教师尤其是新教师的长远发展。二是完善教师发展与培训制度，尤其要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培训交流学习的机会。三是为教师提供更多人文关怀和针对性支持，如“为青年教师提供科研支持，解决科研平台欠缺、科研资金不足等问题”“取消仅针对青年教师的‘非升即走’考核制度”。

五大方面共同聚焦本科教学

大学教师在本次调查开放题中提出的五大方面建议，彼此交叉，存在交集，其中一点聚焦在“学校怎样做才算真正重视教学”这个问题上。概括而言，大学教师普遍关心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希望学校改进管理，让教师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得到保障，不要受过多事务性工作干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培训交流学习机会以提高教学能力、促进个人发展；希望教学工作量、教学贡献在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审中得到充分认可；希望教学投入在学校的资源分配和薪酬待遇中得以体现并得到合理回报；希望得到尊重、支持和关怀，有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发展。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教师对本科教学工作的关注度尤其高，这说明国家近年来在引导高校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方面的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课题组于2021年开展的另一项对于全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最希望教师“真正关心学生”“教学态度好”“教书教得好”。

对比发现，大学教师和学生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共同的诉求，迫切需要高校从制度上予以重视和推进。教师们的建议为高校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指明了改进方向和具体着力点。

完善评价工具疏通痛点堵点

课题组在对部分高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如教务处长、学院院长及专任教师的访谈中发现，许多高校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本科教学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例如，一些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师职业准入机制，将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作为认定教育教学能力、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一些学校实施高等学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在职称评审和绩效评价中显著提高了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的分量。一些学校开展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在学校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确定收入分配办法，实施了内部激励机制。许多学校把教师编写教材案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就业、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参加社团、竞赛展演等育人工作都计入工

作量并加大比重。不少学校加大教师表彰力度，设立教师荣誉制度，通过教师入职、荣休仪式，设立以教书育人为导向的奖励，激励教师潜心育人。有的学校尝试随机抽取教师的教学视频等资料请同行专家进行评议，将其作为教师参加职称评审的重要材料之一，以激发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一些学校行政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也有所转变，比如提出“教务处不是教学监督中心，而是要帮助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

调查结果分析表明，要从实质上体现对教学的重视，当务之急是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工具，这也是“破五唯”背景下最大的难点和堵点。

针对教师们的关切点，课题组对高校提出五点建议：一是继续完善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研究制定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诊断工具，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教学运行、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改革与研究、教学获奖、育人成效等教学工作实绩。

二是进一步提高教学业绩和教书育人实效在薪资结构、绩效分配、职务职称聘任、岗位晋级考核中的比重，避免“重数量轻质量”。

三是制定符合校情的奖惩机制，加大对教学质量高的教师的奖励力度，建立退出机制，对教学质量欠佳的教师进行提醒、培训和帮扶。

四是根据学校的发展定位和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关注教师成长规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引导教师处理好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站稳讲台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五是提高现代学校管理水平，为教师潜心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多渠道增强教师对学校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提高管理水平，简化行政事务，使教师能够更加安心地教书育人。

（作者：王春春，蓝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6-27）

教育学发展要适应高质量建设

中国教育学科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实质性的发展较为缓慢，原创性有待提升。中国教育学者孜孜以求写出一本中国教育学的目标尚未实现。学生学业负担重、学生体质下滑、教育评价不健全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否则有可能影响到实践成效。当前，建立有开阔视野、开放观念，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效力的教育学，成为全面提升教育品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所必须做的基础工作。

立足现代奠定教育学发展基础

春秋时期，我国就有研究教育的学问，成为分科研究与教学的现代学科则是1900年后的事。1905年前后，王国维先生编著了由中国人著的第一本《教育学》并直接用于师范学校教学。在新文化与新教育运动中，中国教育学走上现代化台阶。

中国教育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中国教育现代化方向和目标，“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大任务，教育学发展需要与现代化进程同步，服务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在信息化时代，教育学面临着在新技术条件下对教育规律、教育原理、教育原则的新阐释，需要对教育方式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工具与手段等方面展开新的界定和运用。

不可忽视的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高速发展，教育学的发展显得缓慢。教育学在教育元研究、教育本质、教育产业化、新课程改革等主题进行了大范围的学术争论，在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市场、教育公平与均衡等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也进行了拓展研究，形成主体教育等多个学派，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主体性教育、活动课程和研究性学习等教育思想和观念广为传播，教育学向前探索展现出活力。教育学的发展受论文、论著、课题、学科排名、职称评定、学位点增设及其他量化管理与评价因素影响，科研产出进一步增大，各种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出版总计数百种，但形式化的学术倾向突出，重编写、轻独创、“千书一面”的现象时见，思想深度和实践效力不足，高质量、原创性的教育学作品较少。

增强教育学提升全民教育品质的功能

教育学的发展不会带来瞬时巨大的效益，但没有充分科学、足够先进的教育学就不会有高品质的教育，人民通过教育实现幸福生活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中国教育学发展未能有效解决教育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其原因既有对教育学研究重视不够，也有方式不当和定位误差，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偏离主题现象普遍。

“教育”概念的核心应当聚焦于人的成长发展，教育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成长发展的学问。只有增强教育学提升教育品质的功能，才能为教育学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使教育学发展效力获得提升。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就必须从解决好教育学发展的问题着手。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的开放和解放是教育学原创的源头，教育学作为基础学科，原创性更为艰难，需要对思想、原理、概念进行最纯粹、科学、持续

不懈的艰难探索，需要质疑、批判、探索的勇气，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理论意境、研究视域、核心问题、语言风格上超出原有的阅读边界、学术视野。

第二，建立促进教育学正常发展的社会机制。以下两个机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理论传承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教育学站在人类文明当下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选择，分析、筛选、吸纳古今中外各种与人的成长发展相关的学术信息，在技术和理论上充分利用开放的学术资源市场获取学术发展的理论、方法以及其他资源。不能以无形的“墙”将中国的教育学者挡在世界教育学思想和技术资源的主流市场之外，影响教育学的开放与创新。二是个体筛选和培育机制。教育学的发展呼唤有独特的天赋、极强的使命感、博爱存心、免于功利、视野开阔、兴趣广泛、思维独立深刻和行动力强的教育学者。要开放教育学的研究，激励对教育学感兴趣、以教育学为志业、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参与，借鉴和运用多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学，通过多样性的证据质证、实验、个人体验探求教育原理，更新理论、体系、方法，建构新的教育学。

第三，建立适合教育学发展的学术评价机制。适合学术探索 and 知识增值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教育学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宏观上，它是客观评价、激励探索的环境支撑；在微观上，它确定选题、研究方向，促进整体协调团队的各项资源，体现知识的权力，发挥学术效力。如果教育学发展未形成正常的学术评价机制，真知灼见便难以获得突出展现，教育学也难以及时吸纳、凝练与之相关的各学科精髓，造成原创性不足。同时，论著作者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结构、理论、体系与板块易雷同，缺少基于本国经验的理论阐述，教育学专业水平、实践绩效难以提升。

开辟教育学研究领域

教育学的发展要走出传统的单一学科，拓展新的领域，其中的关键在于：

广义的教育应该聚焦于人的成长发展。教育学应当从人的成长发展过程出发，逐一展开，才有可能更接近本真，探索更高品质 and 更广泛适用的教育学。教育学的学科形态与范式要应需而变，面向宏大主体，同时也要面向个体。学校与地方教育史志本身是从宏大的教育学向个体化、个性化教育学拓展的必要区域，在提升学术化的同时更加聚焦应用，从单一学科走向集成，增强独立性、自觉性、自主性，主动应对信息技术的挑战，顺应学习者中心的变化，面向学习者需求，注重互动而非单向生成。

有效的教育学需要基于实证。由于不重视实证，缺乏实证，理论与实际脱离，

教育与生活脱离，教育学论文和著述往往追求宏大、趋向单一、远离生活、缺乏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无法见诸行动，也难以对教育行动发挥实效。

教育品质提升有赖于教育学的不断改进。教育学需要因应个体成长发展及社会发展需求不断改进。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共生、互生，并相互选择，所以教育要教人做人和创造理想社会，教育改进本身也是教人做人和助力创造理想社会。教育学需要认清“好教育”的相对性，它是相对于具体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特定时间空间而言的。相对于不同人来说，“好教育”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需要各方协商，本着以人为本，依据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创建“好教育”。“好教育”关键在于个体成长得好，需要走出功利、特权误区。教育学者需要定位为教育改进者，明确改进者定位后才能有效推动教育改进。通向“好教育”的方法、路径、过程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每个教育者和成长个体依据自己的条件和未知数去求解。教育者首先需要自主自觉自愿地成为教育改进者，勇敢担当与传承对成长个体和社会的责任，参照相关的基准和当事人的满意度寻找改进机会，充分运用想象和实证方法作为工具，明确界定所要改进的对象，设计好改进方案，不断逐级找到自己的专业改进起点，做有价值、有效果的教育改进。

教育学研究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教育学需要自觉地将以人为本作为学科发展新的理论基础，并据此重新界定教育的内涵、外延，调整教育的定位和聚焦点，以人本视野重新认识教育，看到比过去更加广阔的教育学研究领域，进入全新的教育学研究进程，把“人”放在视野的正中，才能有全新的教育学。以人的成长发展状况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来观察、评价、研究教育，才能写出新的人本教育学。

教育学者在基本和重大问题上有所作为，需要几十年的多方面积累，教育学发展需要在基本和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对于研究团队而言，需要兼容多样性的长时间磨合，组建高质量的学术团队、杰出学者的产生、促进教育学对教育发展的解释与指导能力提升等，都是产生高质量教育学的基本标志。

（作者：储朝晖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2-7-7）